**南 开 大 学**

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及其限度

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的影响上而忽略施蒂纳的作用。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一种极端的“唯我论”和利己主义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道路，他的整个“唯我论”就是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提出的最大反题。因此，马克思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施蒂纳的影响才真正走出黑格尔哲学从而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核，那他便为其后的各学派提供了让理论充分发芽的广袤土壤；而费尔巴哈自认为超越了黑格尔，自认为看到了“绝对精神”的抽象本质因此破解了思辨哲学的秘密；施蒂纳又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之基础上看破费尔巴哈的招数，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式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貌似站在制高点、实际上是站在更现实的土壤中的马克思跳出了上述三人的循环逻辑，洞悉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症结，从而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细致地追踪和梳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发展路线，才可能恰当地把握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人本主义；思辨哲学；类本质；唯一者；现实的人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theory, people tend to focus on Feuerbach's influence on Marx and ignore the role of Stirner. Stirner's “*The Ego And Its Own*” in an extreme “solipsism” and self-interest has opened up a road different from Feuerbach's humanism and the whole “solipsism” of him was the biggest antithesis for Feuerbach. In a word, Marx was influenced by Stirner to walk out Feuerbach's humanism and buil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 certain extent. If Hegel’s “absolute spirit” can be called as the core of the German ideology then he provided the vast soil of theoretical germination for the later school; while Feuerbach thought he has transcended Hegel and saw the abstract nature of “absolute spirit” so that he could deciphering the secrets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based on Feuerbach’s critique of Hegel, Stirner saw through Feuerbach’s tactics and criticized Feuerbach in Feuerbach’s way to criticizing Hegel. It seems that Marx was standing on the commanding height but in fact he was standing in more realistic soil where he jumped out of the loop logic of the three and sighted into the crux of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establish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end. Only by carefully tracing and combing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young Hegelian, it is possible to grasp the internal logic of Marx's thought transformation properly.

**Keywords：**Humanism; Speculative philosophy; Gattungswesen; The Ego; Real Man

目 录

[引言 1](#_Toc512959236)

[一、走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2](#_Toc512959237)

[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 5](#_Toc512959238)

[（一）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 5](#_Toc512959239)

[（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主要意涵及不足 6](#_Toc512959240)

[三、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 8](#_Toc512959241)

[（一）“唯一者”与“类本质”的对抗 8](#_Toc512959242)

[（二）施蒂纳的“唯一者” 11](#_Toc512959243)

[四、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改造 15](#_Toc512959244)

[（一）马克思对施蒂纳“唯我论”的批判 15](#_Toc512959245)

[（二）马克思对施蒂纳“唯我论”的改造 17](#_Toc512959246)

[结 语 19](#_Toc512959247)

[参考文献 21](#_Toc512959248)

# 引言

一切神圣的东西均是一种束缚和桎梏。[[1]](#footnote-1)

——[德]麦克斯·施蒂纳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其中有着许多关键的转折点。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的影响，他使得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开始注重人本理论。但是在费尔巴哈之后的施蒂纳的作用却往往被学界忽视，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许多中国读者，甚至是专业的哲学研究者来说，麦克斯·施蒂纳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人们了解他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关于马克思的研究中……仿佛他只具有附带性或批判性的价值。”[[2]](#footnote-2)实际上，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不仅对费尔巴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马克思后来看到费尔巴哈之局限性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施蒂纳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在西方，对于施蒂纳的争论自从他的著作问世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存在着[[3]](#footnote-3)。在20世纪的中国，也曾掀起过一阵施蒂纳“虚无主义”的思想潮流。施蒂纳鼓吹自我、追求个性的思想与当时中国近代化需求相吻合，许多思想家例如鲁迅、郁达夫[[4]](#footnote-4)都曾注意过他，但这阵潮流持续时间并不长。除此之外，近年来存在主义的复兴在中国掀起一股不小的浪潮，但是对于这一复兴的理解却缺少一个考察坐标，而施蒂纳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开山鼻祖，在他之后，尼采、叔本华、萨特乃至海德格尔纷纷加入存在主义阵营。由此可见，施蒂纳的重要角色不可忽视，对其思想理论进行细致地研讨是十分必要的。

施蒂纳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来批驳费尔巴哈，通过“唯一者”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进行对抗。他将费尔巴哈那种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人本学”视为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类似的一种抽象哲学，费尔巴哈所谓的“新哲学”恰恰又成为了一种“人的宗教”，这种观点在当时有如石破天惊，同时也令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个体性的实在维度，重新反思和深化自己的理论。

正如康德所言，哲学史就是一个战场，但战场并不都是白骨累累，而是留下了很多无形的精神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哲学批判都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费尔巴哈敢于在黑格尔哲学已然成为正统的德国揭竿而起，将批判矛头直指黑格尔，在引起不满和质疑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一种新思路和“新哲学”。同样，施蒂纳在费尔巴哈的批判获得民众肯定的时候，尖锐地讽刺、批评其哲学实质也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哲学，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正是施蒂纳不随波逐流的态度才让马克思开始了对于个体性以及人本学的反思，从而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鉴于我们在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的时候，通常只知道费尔巴哈，却并不知道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还存在着施蒂纳这个关键人物，更不知施蒂纳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追逐自我的先行者的气魄”[[5]](#footnote-5)，因此，本文将会以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的主要观点和批判内容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本文首先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进行简单地回顾，然后以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为主要内容，基于费尔巴哈以及施蒂纳还有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对这几位哲学家思想路线的发展进行追踪和梳理，通过逐层地抽丝剥茧，力图重构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向的内在逻辑。

# 一、走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6]](#footnote-6)因此，对于一个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之评价必须要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这可以让我们在更贴近作者的层面上去体会哲学的意义，达到一种共鸣。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映。众所周知，德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这导致他们对发展和财富的需求极其迫切。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学》时又正值耶拿大战前夕，看到德国的政治文化发展落后于当时的高卢雄鸡的他希望将活力重新注入科学，“科学有希望活跃起来，并且一直活跃下去，如果科学失去了活力，它就要沉睡，萎亡了。从科学汲取了有关世界完整性映像的哲学所制定的，又被从科学赶出来的概念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消除科学概念的抽象，并且进一步扬弃现实过程中的缺点。”[[7]](#footnote-7)所以在这部佶屈聱牙的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概况，更可以透过晦涩的哲学语言看到黑格尔对待政治、对待现实的态度和立场。从黑格尔尊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8]](#footnote-8)的那一刻起，德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和妥协便开始展现，这也决定了黑格尔的一切思想体系都是在一个精神背景之下构建起来的。

“概念所导致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9]](#footnote-9)，这就为一切现存事物提供了合理性，现实中的存在必定可以在哲学中找到依据，这决定了黑格尔对知识的重视——只有我们的知识足够丰富，才能为一切事物提供存在之依据。所以在他看来，追求智慧、爱知识，是一个哲学家永远的追求。精神，则是我们进行自我认知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通过精神，我们才能达到自身存在的自由性，才能达到一种正确、彻底自我体认的状态。但是这里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邓晓芒先生曾表示，当我们直面一个完全没有了解过的“纯知王国”时，我们“除了一个赤裸裸的‘决心’之外，什么也没有。然而，从一个单纯的‘决心’如何能‘外化’出一个纯粹真理的体系，这至少是一个与绝对理念如何单凭‘决心’外化出自然界一样难解的谜” [[10]](#footnote-10)，为我们揭开这个谜题的便是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因为谜底就在于一种以“意识的经验科学”[[11]](#footnote-11)为形式的精神现象学。当意识完全沉浸在对象世界中的时候，意识还缺乏对于自身的把握，这时候的共同认知是与自身毫无关系的彼岸世界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意识继续发展，在它意识到这种能够认清事物本质、解释事情真相的本身也是一种存在的时候，进一步意识到自身其实就是世界全体、世界也就是其自身之时，我们的个体意识便上升为世界意识，即所谓的精神了，也即“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12]](#footnote-12)

除了绝对精神，黑格尔关于宗教方面的思想也引起了费尔巴哈的批判，甚至是更强烈的批判。卡尔·洛维特认为宗教哲学的原则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国家哲学，宗教哲学是他的所有理论中最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黑格尔那里，“世俗智慧”与“上帝认识”都被用来证明我们的信仰具有正当性。[[13]](#footnote-13)对于马克思来说是“颠倒了的世界”的基督教，在黑格尔这里，却是真理一样的存在，黑格尔还将其与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在整体上就是基督教通过上帝的化身为人所实现的那种与现实的和解，作为最终被把握到的和解，它就是一种哲理神学。通过哲学与神学的这种和解，看来黑格尔已经以理性的方式建立了‘上帝的平安’。”[[14]](#footnote-14)黑格尔以他的绝对精神理念在本体论层面为上帝寻找了一个稳固的地位，使其成为一种绝对者，达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平安”状态。黑格尔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神学[[15]](#footnote-15)与哲学之间的断裂与障碍逐渐消融于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麦克莱伦称黑格尔为“哲学与基督教之间发生决裂之前的最后一位哲学家”。在黑格尔之后的费尔巴哈包括基尔克果尔都看到黑格尔这种试图将宗教与哲学融合为一的做法，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反抗。

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费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黑格尔体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把思辨的思维构想成‘它自身的完美实现’……我们搜索整个世界和外部空间，最终只触及我们自己，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面貌通过他性的大量差别和形式持续存在。永远不可能真正遇到那种‘非我’……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困境”[[16]](#footnote-16)。同时，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德里达也曾表示过，这并不是一种现象或过程，而只是一种方法或者意识形态。不过在詹姆逊看来，德里达关于黑格尔的论述也是属于黑格尔式的言论，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很难与黑格尔决裂”[[17]](#footnote-17)。这句话似乎预示着，接下来我将要讨论的两位青年黑格尔派的典型代表——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都渴望突破黑格尔的格局却始终没能跳出黑格尔哲学的宏大体系。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黑格尔哲学的强大张力，因为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宗教哲学的顶点，是过往的全部理论的渊薮。只要是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就无法完全跳出黑格尔体系，只是在以一些不同的形式来表征黑格尔哲学的内容而已。

# 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

## （一）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

葛利高利扬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中最精彩的现象之一，在这个批判过程中，费尔巴哈在很多方面都丰富了唯物主义”[[18]](#footnote-18)。以往对于费尔巴哈的评价多是过大于功，笔者却认为，对于费尔巴哈的评价不应过于简单地定论为一种较为朴素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我们不仅要看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更要看到费尔巴哈所做的哲学工作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还要看到其人本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开篇犀利指出，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与古代所罗门智慧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或者缺点就是无限地延伸自己关于差别和多样的体会，甚至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状态。[[19]](#footnote-19)黑格尔只保存一种排他性的、不包含任何其他因素的时间序列，因此他的思想路径缺少了一种共在状态而只是纵向的延伸。[[20]](#footnote-20)黑格尔将存在的整体性或者绝对性当作宾词来看待，使得自然界发展的各个阶段只有一种历史意义，然而费尔巴哈却认为自然界的发展阶段是与自然界并存的整体的各个环节，并非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那种独立而单一的阶段。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也不例外，也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的，都是对一段特定历史的映射，都有一定的前提和开端。

同时费尔巴哈在这里也表达了一种破除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愿望。费尔巴哈曾明确指出，只有否定黑格尔哲学，才能收获一种新的哲学。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地从黑格尔哲学中发现一种明显的等同——也就是人的本质和人的等同，然而“我们只有将这种等同理解成思辨哲学的全盘否定，然后才能理解、才能了解它是不是思辨哲学的真理”[[21]](#footnote-21)。

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不满与批判，更主要地集中在神学方面，连费尔巴哈自己也承认：“我在我的一切著作里面从来没有放过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它们一直是我的思想和我的生命的主要对象。”[[22]](#footnote-22)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始于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转化，他洞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实质，将其等同于一种思辨神学，从而使得自己的批判工作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在批判黑格尔的思辨神学的同时也瓦解着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作为神学最后避难所和支柱的黑格尔哲学，必须得到批判和拒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拒斥了神学；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绝对精神实际上也是一种神学的变式，因此也应该得到否定。

费尔巴哈像这样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也就论证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合理之处。由于受到黑格尔和鲍威尔的启发，费尔巴哈在改造他们的“绝对精神”及“自我意识”的同时提出“人”这一范畴，进而他也像其他青年黑格尔派[[23]](#footnote-23)哲学家一样，开始了丰富主体性意涵的工作。“施特劳斯通过对福音书形成史的考证，特别是通过对上帝‘人化’的批判，不仅进一步开辟了从神通向人的道路，而且也预示了从‘理念’向‘类’的过渡”[[24]](#footnote-24)，费尔巴哈就是在施特劳斯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将这条由“神”通向“人”的道路开拓得更加宽阔也更加引人注目。

## （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主要意涵及不足

费尔巴哈对人本主义的诠释和发展诉诸几个关键概念，其中“类本质”是人本学的核心范畴。针对黑格尔哲学的特殊与普遍、个体与整体的分裂与矛盾，费尔巴哈渴望通过“类”的概念将其整合，因此他赋予“类”两种主要内涵：个体性与自然性。在费尔巴哈看来，“类”概念并不是简单的个体性，而是一种超越了之前个体的、具有普遍性的其他一切个体。但我们知道，费尔巴哈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他并没有在实在的层面上对于普遍性的个体做出解释，所以这种“类”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性，只是一种多样性个体的集合而已。也正是由于视野的狭隘性，费尔巴哈才进一步把人的“类本质”简单归结为精神层面上的“理性”、“意志”和“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25]](#footnote-25)费尔巴哈只讲德性与品质，这让他的人本学中唯一残存的那点社会性也滞留不前，他甚至将这种精神性的内涵上升为整个人本学的基本要义。他还将人与人之间的爱扩展到实践领域，因为他认为这种最高本质必须一以贯之。[[26]](#footnote-26)费尔巴哈的实践人本学到此戛然而止，他并没有对于其实质内涵进行深入的讨论，费尔巴哈学说的抽象性在此展露无遗。

费尔巴哈宣称的“新哲学”首先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新哲学是转变为理智的心情”[[27]](#footnote-27)。其次，费尔巴哈对人本主义的本体论进行了解释说明。他在这一部分着重强调了“感性直观”的作用。在费尔巴哈的逻辑框架中，“存在并不是一种可以与事物分离开来的普遍概念，存在与存在的事物是一回事”[[28]](#footnote-28)，他用直接性与感性存在来反对黑格尔哲学的间接性，强烈反对存在和存在事物的分离，这其实是把直观作为了一种表达存在的方法和手段，而没有内化于存在自身的逻辑框架。因此卢卡奇把费尔巴哈的这一做法称为“辩证法的取消”[[29]](#footnote-29)。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存在的对象性理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30]](#footnote-30)。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是一种完全没有对象的绝对主体，然而费尔巴哈却说人类只有通过对象才能认识自身。这种对于对象的意识其实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借此，费尔巴哈指出，所谓的上帝、所谓的绝对实体其实就是人的绝对本质，因为所谓对象赋予我们的那种威力，在本质上说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的威力[[31]](#footnote-31)。这就是所谓主词与宾词的互换问题。根据费尔巴哈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宗教中的一切宾词拿来作为主词，但问题在于，这种逻辑上的词项颠倒是否成功地实现了颠倒黑格尔哲学的目的？我们是否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一切宾词呢？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马克思在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一样，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并没有完全成功。通过上述几点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理论存在着不止一处的矛盾和错误，因而经常将自己困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他的人本学只是漂浮在精神、意志等唯心土壤表层的学说，无法扎根于实存，更无法为人的本质提供坚实的现实性基础。另一方面，费尔巴哈的功劳在于将神学拉回地面，破除人们对于上帝、对于神的无限信仰和绝对崇拜，这对于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马克思也从《基督教的本质》中采取了人是一种在类中并通过类而完成自己的本质，人是一种‘类本质’的观念”[[32]](#footnote-32)。

费尔巴哈知道黑格尔哲学的错误在于站在一种神学的立场上，殊不知，费尔巴哈自己也并未脱离神学，在此之后他的做法便再一次陷入黑格尔的哲学泥潭。他只不过将神学转化为了人学，他所宣称的“新哲学”只不过是把抽象的“人的本质”奉为至高无上的一种人本主义神学[[33]](#footnote-33)，这正如麦克莱伦所说，“费尔巴哈的全部著作受一个思想即宗教的思想支配着”[[34]](#footnote-34)，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黑格尔哲学别无二致。然而，在费尔巴哈的时代，已经被基督教禁锢了太久的人们听闻这个宣扬人本主义的学说都异常兴奋，很少有人真正看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首先看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质的是施蒂纳，也正是他率先扛起批判费尔巴哈的大旗，以犀利的语言和极端的“唯我论”与费尔巴哈针锋相对。

# 三、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

## （一）“唯一者”与“类本质”的对抗

前文已经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评做了简单回顾，这是以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施蒂纳的与众不同和针砭时弊。但是施蒂纳的批判之路似乎并不顺利，他的极端情绪与理论并没有令别人信服，反而招致许多批驳之声[[35]](#footnote-35)，这不仅因为施蒂纳批判了费尔巴哈，还因为“共产主义者、批判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改革者都受到施蒂纳哲学的攻击”[[36]](#footnote-36)，因此施蒂纳哲学是恩格斯所指的那种“自我主义”哲学。在所有对施蒂纳的批判中，我们最熟悉的要数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评价：“思维的肤浅、杂乱无章，不能掩饰的笨拙，无尽无休的重复，经常的自相矛盾，不成譬喻的譬喻，企图吓唬读者……总之，整个四百九十一页的一部书就好像是按照朗福德的方法所煮出来的一碗淡而无味的杂碎汤。”[[37]](#footnote-37)马克思的评价仿佛只放大了施蒂纳这本著作中的缺点却没注意到其内在含义，因此不能说十分准确，施蒂纳的文章也并非如此不堪。著名学者帕特森恰恰从反面给出了结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不经意地赞美了施蒂纳的哲学思想。”[[38]](#footnote-38)这说明，马克思不但没有看低施蒂纳，反而很重视他的理论，因此才肯花大量篇幅来批判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对施蒂纳做出客观评价，他还称施蒂纳为青年黑格尔派最后的代表和终结者。由此可见，青年黑格尔派对于主体性的论争对后来的哲学发展路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代表了在马克思理论形成之前对于主体性这一问题探讨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来考察马克思给予施蒂纳的批判，便可体会到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不可忽视的。

施蒂纳的全部任务就是反对费尔巴哈，批驳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费尔巴哈人本学尊奉“人”为新的信仰对象，用“人”偷换了“神”，站在费尔巴哈对立面的施蒂纳反其道而行，强调自我。他认为，在他之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对于个体性的解释大多诉诸一般的普遍存在，而作为个体的“人”则被无限压制和束缚，他便企图从现存世界中寻找一个可以弥补这种抽象性的存在物，他的目标最终落在了“唯一者”那里。施蒂纳的“唯一者”非常类似于费希特口中的纯粹自我[[39]](#footnote-39)，即不与外部世界有任何关联而只是“我”自身的唯一存在，但是却比费希特的纯粹自我概念增添了一点社会性。然而，施蒂纳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现实个体的实在性，而只是通过极端的语言在表面上强调这一“自我”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施蒂纳这一做法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是间接批判了所有宗教的弊端，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他并没有将矛头直指宗教，而是在费尔巴哈以及鲍威尔对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批判，达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目的。所以说，施蒂纳在一定程度上猛烈地冲击了固守黑格尔阵地的哲学思想，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走在了许多哲学家的前面。

在写作手法上，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多采用第二人称，也就是一种对话的方式，加之他语言的感染性极强，就仿佛在对我们进行说教。从具体内容来说，施蒂纳首先表达了他对于费尔巴哈“人本质”理论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在费尔巴哈的语境下，我们都是与自身的精神相分离的，处于一种“我”和精神的分裂状态。“费尔巴哈所努力给予我们的解放何以完全是神学意义上的解放。”[[40]](#footnote-40)这就是说我们当前仍然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彼岸世界寻觅人类的实质所在，然而我们所寻找到的那个“神”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费尔巴哈这种做法只是以一种绝望的方式留住基督教，而不是摈除掉它。[[41]](#footnote-41)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并不彻底，而是变相为宗教神学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样一来他的人本学也成为了一种宗教的变体，所以施蒂纳称“人的宗教只是基督教宗教的最后的变形”[[42]](#footnote-42)。费尔巴哈也就在刚刚将人类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之后又继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宗教选择。施蒂纳精准地把握到了费尔巴哈宗教人本学问题的关键，在麦克莱伦看来，施蒂纳便是利用青年黑格尔派最典型的手法，运用费尔巴哈的理论出发点来批判费尔巴哈的理论使其自相矛盾，从而显示出他的理论没有坚持到最后。[[43]](#footnote-43)

费尔巴哈建立人本主义宗教的典型做法是强调思辨哲学与宗教神学的秘密在于主词与宾词的颠倒，因此他宣称只要我们颠倒主词与宾词，就可以轻松洞察思辨哲学的错误与漏洞，这一点在前文也曾提到。不过他的这种做法还是逃不出施蒂纳对他的批评，这依旧是没有脱离宗教的土壤去另辟蹊径，因为他在潜意识中完全没有想到要彻底消除宗教。在他将主词宾词颠倒之后，宗教的内容依旧存在。跳出这个怪圈，我们就可以看到,费尔巴哈只不过是在进行着偷换概念的语言游戏而已，并将自己新的至高无上者——“人本质”奉为新的神。这无异于将我们重新置于基督教开始的基点那里，可是,谁能保证从神那里找到的人的本性的确是我们的真实本质呢？确如同施蒂纳所说，在费尔巴哈人本学面前，我们就如同重新处于基督教的开端一样，即将成为一个虔诚的人本主义信教徒。施蒂纳却为我们说明了真实情况，他认为这样只是为人们更换了一个主人而已，我们始终是在被奴役和压榨的。按照施蒂纳的思路，神压榨折磨人的思想，而发现了这样秘密的人所创造的人学宗教对于人的压迫只能愈加残酷。

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的批评可以说是一击致命的，他精确地找到了费尔巴哈思想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招数背后的实质，并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因而施蒂纳的整个“唯我论”就是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提出的最大反题。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特点也在于此，他利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法来指责费尔巴哈也并未将自己的观点贯彻到底。

通过对于施蒂纳思想的总体把握，显而易见他是一名彻底的利己主义者[[44]](#footnote-44)，他的“唯一者”理论也不过是对于“自我”合理性的最大范围的维护和辩解。不过马克思告诫我们，并不能将施蒂纳同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等同起来，“正如我们在‘旧约的经济’及其后已经看到的那样，圣桑乔所论述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同庸俗的利己主义者混淆起来。”[[45]](#footnote-45)因为这种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自己，只是在普遍层面上追求一种满足而已。接下来将对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核心概念“唯一者”进行详细讨论，以此来更深地体会他的“利己主义”哲学。

## （二）施蒂纳的“唯一者”

破旧在于立新，施蒂纳之所以强烈批驳费尔巴哈，目的除了反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在于为自己的利己主义理论铺平道路。首先，在历史观方面，他通过简单的类比手法将人类作为个体的发展进程投放到整个人类进化史中去。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儿童——青年——成年”的过程，在对其进行论述之后便投放之于人类发展史，对应于古代人、近代人和现代人。孩童时代的我们“乐于打破、乐于捅开隐秘的角角落落，搜索被掩蔽和被抽走的东西，并对一切事物都做尝试”[[46]](#footnote-46)，所以一切活动和思想的前提都是现存的物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身为儿童的我们并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只是处于一种简单的学习状态。发展到青年时期，我们更多考虑自身利益问题，同时也更善于顺应世界的现实状态而不是妄想能够改变世界[[47]](#footnote-47)，因此，精神和理性开始对青年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青年自控能力差，对世界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比较容易丧失自我。当我们成为一个成人则“愈益把自己作为中心点”，根据世界原本的面目去对待世界的同时按照自己心之所想来为人处事。通过逐层深入的证明，施蒂纳自以为找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相通之处，便以古代人等同于儿童，以近代人等同于青年，以现代人等同于成年。古代人像儿童一样，受制于生存环境；近代人开始认识真理，试图用他们的满腔热血来改造环境与世界，施蒂纳效仿了黑格尔的方式，用自己的唯一者代替了精神，同时也将历史的前进看作是思想的前进。然而在近代人向现代人转化的过程中，一种自由主义出现了。

自由主义包括三方面：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以及人道自由主义。从施蒂纳对于自由主义的分类与概括就可以看出他为自己设定了潜在的批判对象，也就是包括鲍威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这一做法令他的批判又同时获得两种效果：既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上述人的学说。[[48]](#footnote-48)鲍威尔宣称应该建立一种自由的国家，然而“国家”在施蒂纳看来已经是一种束缚，因为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新教的第二阶段并与‘宗教自由’完全是平行的”[[49]](#footnote-49)。当我们把自己的权力和特殊利益献给国家的时候，我们便把国家奉为此岸的神。同理，在施蒂纳看来国家的最高且最纯粹的形态就是社会，因此，对于国家的批判也可以放在对于社会自由主义的批判这里。这是针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赫斯、马克思等人的反驳[[50]](#footnote-50)。这在施蒂纳看来不过是让个人的财产被整个社会所掠夺，让社会成为那个新的抽象观念。至于人道自由主义，便是施蒂纳主要批判的费尔巴哈所代表的理论。费尔巴哈的“爱之宗教”强调人的“类本质”，这使得人具有了神性，成为一种抽象概念。可以看出，施蒂纳的理论中充满了激进与反叛色彩，“施蒂纳的‘反叛’原则避免了他认为具有革命性质的专制制度的需要。‘反叛’是对每一种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个人激情、能量和愤怒的释放；个人自我主张和愤怒爆发的结果，不是一种新的政治或社会形态，而是利己主义者的非系统的‘联盟’”。[[51]](#footnote-51)按照他所设想的那样，政治自由主义废除了主仆关系之间的不平等；社会自由主义消灭了财产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人道主义破除了人们对于神的迷信和绝对信仰。但是问题在于主人、财产、神又会随着国家、社会再次出现，这些改变始终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而只是在抽象层面隔靴搔痒而已。

如果上述自由的合理性全部被否定，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从何而来？答案的关键就在于现代人，也就是“我”。“施蒂纳在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是他本体论的逻辑延续，他对社会权力的诋毁表示他努力想要取代本质的权力并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52]](#footnote-52)所以说，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是贯穿于他的整个学说之中。“只有少数的人，在自由之中成为一个自由人，被诅咒成为主人和奴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可是，一个像其他人一样骄傲自信、从他身上剥夺了这一连串关系的人，毫无蔑视和仇恨地走到他们中间，没有任何怜悯和爱，从而实现了他所承认的生活必要性。”[[53]](#footnote-53)由于“我”作为利己主义者所具有的独自性，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独自性意味着“我”就是自由的唯一标准，自由从“我”这里产生，如何利用自由也成了“我”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在“我”所拥有的所有事物的范围内，“我”才是唯一支配者，这便是我的本质所在。[[54]](#footnote-54)因此，施蒂纳提出的解放自我的道路正是走上一条高于一切的道路，只有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让自我无限上升到所有限制之上。[[55]](#footnote-55)作为所有者，人对自己的所有权体现在如下三方面：我的权力、我的交往、我的自我享乐。

权利的概念在施蒂纳看来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只要我享有权力，我便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来给予权利。权利在施蒂纳看来是一种反面存在，它是由我们凭空乱想出来的，关于权利的授予者我们无从寻找；而权力则不同，它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是确实存在的。[[56]](#footnote-56)交往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进行的活动，然而施蒂纳意义下的“唯一者”在交往时，具有一种吞噬一切的可怕性质。交往就是要享受世界，享乐就是要获得一切喜爱、仰慕的东西。“如果你把自己看得比人们为此而给予你的要强大，那么你就拥有更大的力量；如若你把自己看得更重，那么你拥有的就更多。”[[57]](#footnote-57)在此基础上，“我”向往的理所当然就要占为己有。可以说“唯一者”高于一切，唯一者也先于“所有者”。“唯一者”产生于一种无之创造性，继而才会出现“所有者”，所以施蒂纳才将“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

施蒂纳的“唯我论”把“人”带到精神领域和现存世界，成为一种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的哲学，他令在此之前一直关注着人的“类本质”的费尔巴哈、鲍威尔、马克思等人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人的重要性，更说明了以前那种通过人的“类本质”来确立人的中心地位的人本学是矛盾和错误的。“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费尔巴哈在受到主张批判彻底化的施蒂纳的批判后向施蒂纳方向的急速逆转（或倒退），更不用说施蒂纳本人的思想，都凸显了过分强调感性、世俗的庸俗性及其理论后果，给马克思以巨大的警觉和提醒”[[58]](#footnote-58)，所以 “即使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问题的提法与致思取向上也明显带有由于这种新的思想刺激所引发的灵感”[[59]](#footnote-59)。在施蒂纳这里，以前的那些牢固附着在主体之上的神圣性和光环已被完全撕开，每一个个体都能够作为“自我”独自发展。同时，施蒂纳极端的“唯我论”中包含着大量政治以及哲学思想流派的萌芽，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等都在此率先汲取营养，占领开枝散叶的先机。施蒂纳的思想对于后来的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以及本雅明·图克[[60]](#footnote-60)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综上，可以说施蒂纳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先驱哲学家。

不过，施蒂纳的缺点就在于他的理论太过极端，这不仅会引起一些学者的反感，同时也使得他自己的理论构建出现问题，因此他的理论必然会向反面不断运动。就像马克思所说，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的终结者，因为他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在黑格尔的地盘上做着自以为跳出框架的挣扎，但其实这仍旧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方式。“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61]](#footnote-61)这并不是施蒂纳的个人原因，而是与德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时代背景有关系，施蒂纳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做了最大限度的挣扎，只不过这种主体性依然是抽象的，最终实现“临门一脚”，将“人”真正从抽象带到现实的是马克思。

# 四、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改造

## （一）马克思对施蒂纳“唯我论”的批判

本文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受到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并非忽视了马克思的个人独创性，而是为我们评价哲学家提供一种更广阔全面的思路。曾经作为一名人本主义者的马克思是如何看清费尔巴哈的弱点而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过程中施蒂纳虽未起到决定作用，但肯定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渊源深厚，他的哲学思想也是在二者的关系中生长出来的。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达到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所达不到的成就与高度，就在于马克思不同于以往“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而是“新瓶装新酒”的同时也汲取了前人思想中合理的部分。正由于马克思跳出黑格尔的哲学环境，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才得以看到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费尽心力也无法完全批判的东西。

施蒂纳宣称自己的事业以“无”为基础，马克思与施蒂纳分庭抗礼，这说明马克思的基础并非“无”，而是一种相对于“无”的“有”，是一种立足社会现实、立足历史背景的“实有”。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与施蒂纳两位哲学家的对抗，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第一次正面交锋”[[62]](#footnote-62)。在笔者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书的名字就说明，不管是费尔巴哈还是施蒂纳抑或是鲍威尔等人，都不过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而已，都是依旧停留在思想、停留在头脑中的、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费尔巴哈的“人本质”、施蒂纳的“唯一者”，无一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所构造出来的概念，他们先是创造出一个普遍范式，然后将人类局限在这个范式之中，这样的哲学不会带领人们前进半步而只会让人们裹足不前。约翰·卡罗尔对此总结：“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推翻了施蒂纳的批判，就好像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一样：通过展示一个永远也无法逃脱的消灭自己尾巴的恶性循环来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利己主义的社会理论对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提供了最深刻的观点，也揭示了施蒂纳哲学的局限性。”[[63]](#footnote-63)

施蒂纳“唯一者”之独自性，被马克思称为“德国小资产者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所进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饰”[[64]](#footnote-64)。在当时的德国，哲学是具有政治意味的，施蒂纳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现状。施蒂纳主张个性、自由，还强调个人财产，他的理论是无法与财产尤其是个人私有财产完全分离的。我们都知道，想象中的东西并非全都可以无条件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它们必须需要一定的客观性与实在性。就如同财产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是一种属于社会的概念，社会关系中的人际交往以及阶级对抗之中存在着财产的流动，而施蒂纳只是狭隘地将财产据为己有。这一点，也是施蒂纳对于马克思影响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让马克思直面现实社会中的经济问题，更让马克思找到了解决无产阶级异化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就是私有财产。马克思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养分，从形而上走进现实生活，走向现存物质。

借助马克思的启示，我们可以发现，施蒂纳的“唯一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65]](#footnote-65)。施蒂纳取消了一切标准与规范，将人们业已接受的规则、制度都视为无足轻重的存在，因为所有的国家、法律、制度、上帝都要服从于每个人自我意志的判断。“主张多样性、否定掉普遍性的统一规范之后，不就为弱肉强食原则开路了吗？不陷入了一种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吗？”[[66]](#footnote-66)这个论断与德国现实完全吻合，德国小资产阶级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受到压迫，这导致他们的生活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施蒂纳的“唯我论”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追求物质的“康庄大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普遍性的反对与消除其实是一种社会层面上的倒退，如前所说，“唯一者”是最高的存在，任何东西都是出于自身的，如此一来所有依据也都可以在“唯一者”自身寻找，社会法律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个体在此脱离了必要的社会监管与束缚，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求随心所欲，因为施蒂纳告诉人们：这是正当的！这种短浅的目光决定了施蒂纳注定无法跳出资产阶级的限制看到真正的答案。偶然性才是施蒂纳“唯一者”的真实特征，施蒂纳极端地把人在所处社会之中显现的那些无法摆脱的关系作为每个人的个性，进而忽视以往哲学家们对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探讨，他犹如沙漠中的鸵鸟，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67]](#footnote-67)“施蒂纳哲学创新的基础就是本体论：他对于宗教、道德、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观点都源于他对于存在的态度。他的整个工作存在者一种基本的现实秩序，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体的存在。自我首先存在，然后开始定义自己。”[[68]](#footnote-68)就像马克思曾指出的一样，施蒂纳是将偶然性加工成了必然性，施蒂纳的做法很容易跳入自己布下的无限循环圈套。虽说他带着批判的目光审视一切，但是他太过绝对地强调个性很容易令自己的理论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辩护依据。

施蒂纳在反对社会共同体、反对共产主义方面的做法更是惹恼了马克思，马克思甚至“激烈地、咄咄逼人地对施蒂纳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不再简单地嘲笑施蒂纳的学习、逻辑和技巧，他可以集中所有的嘲讽和粗鄙的讽刺，但同时也概述了斯特纳的观点中所固有的缺陷。人们在屈服于革命理想和革命组织形式时，是否以巨大的代价取代了一种形式的屈从，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回答的一个问题。”[[69]](#footnote-69)马克思在宣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为个人提供创造性和自由发展空间的社会而不是一种空洞的社会之时，就已经将施蒂纳纳入自己的视野之内了。

## （二）马克思对施蒂纳“唯我论”的改造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施蒂纳对于“人的本质”以及个体性内涵的过程中，才构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框架，并把前人未完成或未进行彻底的工作全部完成。海德格尔的学生之一卡尔·洛维特也说，马克思真正向我们揭示了施蒂纳思想的内在实质，不过就是一种资产阶级面对社会现实而发出的抱怨，尽管在施蒂纳看来他的“唯一者”完美地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束缚与规定，达到了一种自由性。[[70]](#footnote-70)马克思跳出了弱小无力的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现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解读了这一现象，这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正是通过追溯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与马克思的理论联系，我们才得以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哲学内涵与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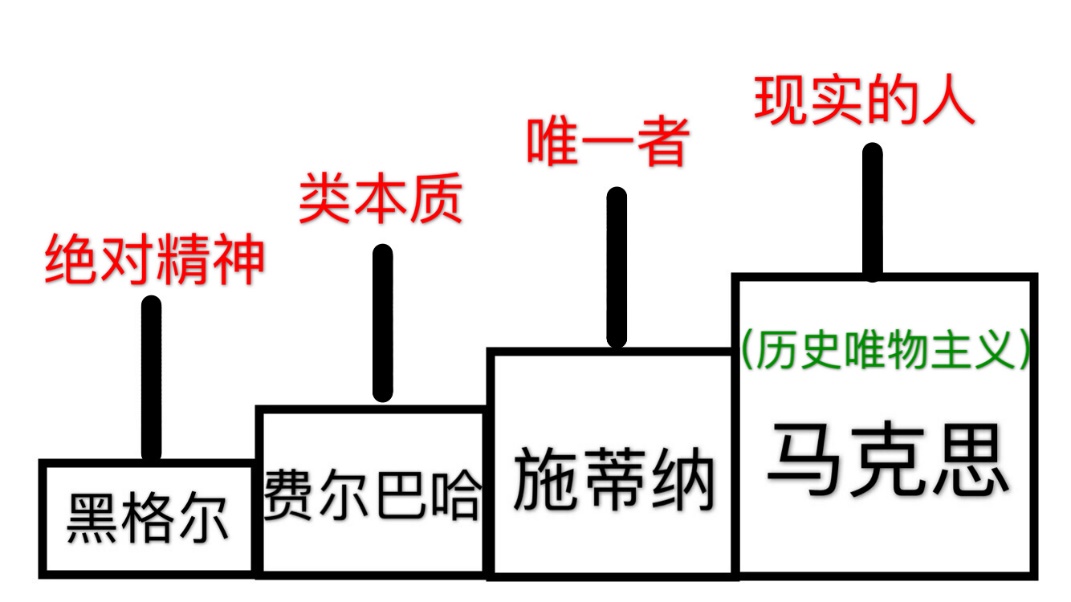
简单地说，马克思的补充和改造保留了施蒂纳个体性中合理的部分，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他把被施蒂纳赶出去的、超验的理想价值重新带回来，带到人之中，让“人”这一概念拥有最丰富最全面的内涵。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中，不仅存在着无限的社会性，还包含着超越现实的普遍价值。因此，马克思是将抽象性与具体性结合起来，站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待人的现实价值。麦克莱伦在为马克思写的传记中把马克思称为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又称为一个曾经的主观主义者，“但是，现在，观念似乎内在于现实之中了。”[[71]](#footnote-71)在马克思眼里，这种肩负着改造社会、创造历史重任的“现实的人”，其实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破除自身“物化”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交际网中，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的约束和限制，同时无产阶级因为自己的劳动生产活动而消去了施蒂纳“唯一者”的虚无色彩。至此，马克思完美地融合并发展了人学理论，将其改造为一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科学理论。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问题的开始，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与施蒂纳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要改变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所共同陷入的僵局：也就是将几个不同的思想观念当作思想枷锁套牢人们的头脑，只不过施蒂纳在这条路上没有走得很远便失败了，他甚至创造出了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在施蒂纳那里不可侵犯的概念其实并不具有现实中的躯体——不是有形体的个人，这被马克思称为“跳蚤的跳跃”，因为施蒂纳其实是返回了黑格尔逻辑，用黑格尔方法去构建自己的“唯一者”。[[72]](#footnote-72)马克思坚信，不是意识决定了生活，而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决定了意识活动。正是由于不断进行着物质交往和生产生活的我们，现实世界才得以该改变，属于世界的一部分的人理所当然也被改变，同时我们的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73]](#footnote-73)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进行的物质生产以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表明了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就是在如此表现着自己，这是由他们作为人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将个人只是看作现实的个人，而意识产生于个人的活动，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将意识等同于个人的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施蒂纳，他把现实中的社会关系果断地与个人隔绝，这样一来有关于此的哲学范畴便也没有了哲学内涵。[[74]](#footnote-74)马克思在施蒂纳的“具体的人”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造，为这个单薄无力的概念注入新的内涵和灵魂，让这个“人”真正成为现实生活中丰富、鲜活的人。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是从对施蒂纳的批判那里找到了更多关于构建唯物史观的契机和灵感，进而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通过注重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中的“人”这一关键点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75]](#footnote-75)德国的先天条件不足使得马克思另寻高就，他接受了政治经济学的定理，认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是经济。因此他从人类利益的可变概念开始重新定义经济学，真正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站在高于施蒂纳的思想平台上，反思自己在青年时代所受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余毒”，这样一来他才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也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话语体系。

#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要地构造一个图形来表示马克思、施蒂纳、费尔巴哈、黑格尔几个人的关系。这几位哲学家层层递进，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因此他们仿佛由高到低站在一排阶梯上：



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核，为后面的各学派提供了理论发芽的广袤土壤；那么费尔巴哈便自认为高于黑格尔，自认为看到了“绝对精神”的抽象本质因此破解了思辨哲学的秘密；施蒂纳又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之上看破费尔巴哈的招数，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式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貌似站在制高点、实际上是站在更现实的土壤中的马克思跳出了上述三人的循环逻辑，洞悉了青年黑格尔派个体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每位哲学家的观点都不可忽视，都在相应的转折点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重点讨论的施蒂纳也是如此。

施蒂纳与马克思在同一块自由的荒野上相互对立，由于立足点的不同，施蒂纳最终回归到独一无二的“自我”，正如洛维特所说，“《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生存，全靠自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里，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都成为他独特的世界的所有者。为了这场革命，施蒂纳返回到‘创造性的无’里面。从这个无出发，他以一种终极史的视野勾勒了异教和基督教的‘旧’世界和‘新’世界。”[[76]](#footnote-76)不过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哲学方面有重要建树，还在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文学艺术领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77]](#footnote-77)；而马克思强调现实，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否认了黑格尔哲学的至上性转而采取一种人本主义，通过施蒂纳，他又不得不跳出费尔巴哈那种静止的人本观点。由此可见，施蒂纳既启发了马克思，又有过于极端和抽象的地方，总体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施蒂纳的作用还是有目共睹的。

透过本次追踪和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一位哲学家的评判和定位不光要在他个人的维度上去考察，更要“瞻前顾后”，了解他的背景和环境，了解他的理论来源和后续发展，这样才能不断在经典中得到新的启发。

# 参考文献

（一）著作

[1]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9] [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王逢振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0]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 荣震华、李金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 荣震华、李金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 [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3]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4] [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 [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一卷）.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7] 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8] 王时中.实存与共在：萨特历史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9] [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James Huneker. Egoist: A Book of Superman. Charleston：Nabu Press，1909.

[22] R. W. K. Paterson. The nihilistic Egoist*:* Max Stirn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3] Saul Newman. Max Stirner.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1.

[24] John Carroll. The anarcho-psychological critique: Stirner, Nietzsche, Dostoevsky .London: The Gresham Press，1974.

[25] John Henry Mackay. Max Stirner: His Life and His Work. California: Peremptory Publications，2005.

[26] John F. Welsh. Max Stirner’s Dialectical Egoism: a new interpretati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2010.

（二）论文

[1] 林钊.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施蒂纳研究回顾.福建论坛，2012,6:50

[2] [美]劳伦斯·S.斯特佩勒维克.论施蒂纳与费尔巴哈.林钊译.学海，2011,1:60~61

[3] Lawrence S. Stepelevich, The Revival of Max Stirn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4,35(2).

1.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34页。 [↑](#footnote-ref-1)
2. 林钊：《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施蒂纳研究回顾》，载《福建论坛》2012年第6期，第50页。 [↑](#footnote-ref-2)
3. 不仅有文德尔班在其著作《哲学史教程》（《History of Philosophy》）中将施蒂纳称为奇怪的人，社会主义的宣扬者赫斯也对施蒂纳进行了批驳。桑塔亚纳在《德意志思想：一种哲学考察》（《The German Mind: A philosophical Diagnosis》）称施蒂纳为“勇敢的批评家”，可见学界的学者们对于施蒂纳的评价褒贬不一、各执一词。——引自[美]劳伦斯·S.斯特佩勒维克：《论施蒂纳与费尔巴哈》，林钊译，载《学海》2011年第1期，第60-61页。 [↑](#footnote-ref-3)
4. 郁达夫曾说：“一切权威都没有的，我是唯一者，我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好忠于我自家好了，另外一切都可以不问的。”——摘自郁达夫：《郁达夫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footnote-ref-4)
5. James Huneker, *Egoist: A Book of Superman* (Charleston: Nabu Press,1909),pp.352. [↑](#footnote-ref-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8页。 [↑](#footnote-ref-6)
7. [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footnote-ref-7)
8. [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第203页。 [↑](#footnote-ref-8)
9.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页。 [↑](#footnote-ref-9)
10.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4页。 [↑](#footnote-ref-10)
11. 参见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第144页。 [↑](#footnote-ref-11)
12.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0页。 [↑](#footnote-ref-12)
13. 参见[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0页。 [↑](#footnote-ref-13)
14.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第62页。 [↑](#footnote-ref-14)
15.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这里所谓的神学并不同于以往的基督教神学。因为黑格尔其实也对于正统神学的反动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它的起点是神学，不过不是正统的神学，而是一个以理性和自由为旗帜的神学；不是充斥着烦琐的、人为的、实证的教义的教会，而是‘无形的教会’。对那以传播蒙昧主义为宗旨，以巩固盲目崇拜为目标的正统神学，黑格尔虽然没有像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斗士们那样的犀利的挖苦和尖锐的讽刺……谁能说，黑格尔对正统神学的反动本质的认识不深刻呢？”——引自[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1页。 [↑](#footnote-ref-15)
16. [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王逢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122页。 [↑](#footnote-ref-16)
17. 参见[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第194页。 [↑](#footnote-ref-17)
18.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 [↑](#footnote-ref-18)
19.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45页。 [↑](#footnote-ref-19)
20.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46页。 [↑](#footnote-ref-20)
21.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5页。 [↑](#footnote-ref-21)
2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8页。 [↑](#footnote-ref-22)
23. 麦克莱伦称，由于青年黑格尔派是哲学学派，所以他们对待宗教和政治的态度必然是一种理智的态度。这种哲学可以被称为思辨的唯理论，他们的理论中包含了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还包含着启蒙运动的批判倾向以及对法国革命原则的崇拜。——引自[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footnote-ref-23)
24.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footnote-ref-24)
25.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8页。 [↑](#footnote-ref-25)
26.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15页。 [↑](#footnote-ref-26)
27. 侯才将其翻译为“新哲学是理智化之心”，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质学说直接受到了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学说的影响，费尔巴哈明明看到了斯宾诺莎的上帝学说只是把对立内在于上帝自身而已，却由于自身哲学和视野的片面性未能逃脱这一矛盾的漩涡。——引自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footnote-ref-27)
28.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57页。 [↑](#footnote-ref-28)
29. [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3页。 [↑](#footnote-ref-29)
30.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9页。 [↑](#footnote-ref-30)
31.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0页。 [↑](#footnote-ref-31)
32. [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8页。 [↑](#footnote-ref-32)
33.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写到：Homo homini Deus est，意思是：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 [↑](#footnote-ref-33)
34. [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88页。 [↑](#footnote-ref-34)
35. 由于其极端的自我抬高充斥着个人主义倾向和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色彩而时常被人称为唯利是图的无耻

    之人，更有甚者，竟将他视为精神上有问题的疯子，说他表现的完全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矫揉造作的悖论”。 加之当时费尔巴哈的学说广泛流传，一大批费尔巴哈的拥护者揭竿而起对施蒂纳进行批评，包括当时的政治家卢格、神学家施特劳斯、作曲家瓦格纳等人。——引自[美]劳伦斯·S.斯特佩勒维克：《论施蒂纳与费尔巴哈》，林钊译，载《学海》2011年第1期，第59页。 [↑](#footnote-ref-35)
36. Lawrence S. Stepelevich, “*The Revival of Max Stirn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XV (Apr.-Jun.,1974),pp.323. [↑](#footnote-ref-36)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5页。 [↑](#footnote-ref-37)
38. R. W. K. Paterson, *The nihilistic Egoist: Max Stirn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7. [↑](#footnote-ref-38)
39. 费希特的纯粹自我更具形而上学性，“自我一般地就是自我。自我由于它是它自己所设定的，所以它绝对

    地就是同一个自我。那么特殊地说，自我既然是进行表象的东西，或者说，它既然是一种理智，那么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当然也就是同一个自我。”——引自[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一卷，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66页。 [↑](#footnote-ref-39)
40.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3页。 [↑](#footnote-ref-40)
41. 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4页。 [↑](#footnote-ref-41)
42.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89页。 [↑](#footnote-ref-42)
43. 参见[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127页。 [↑](#footnote-ref-43)
44. 美国学者劳伦斯·S.斯特佩勒维克曾将施蒂纳与费尔巴哈分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大阵营，“按照所谓‘辩证法’，作为黑格尔学说逻辑终点的‘具体的普遍性’分裂成了两个相反的观点：施蒂纳的具体的利己主义和费尔巴哈普遍的利他主义。”——引自[美]劳伦斯·S.斯特佩勒维克：《论施蒂纳与费尔巴哈》，林钊译，载《学海》2011年第1期，第58页。 [↑](#footnote-ref-44)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9页。 [↑](#footnote-ref-45)
46.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8页。 [↑](#footnote-ref-46)
47. 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2页。 [↑](#footnote-ref-47)
48. 参见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第261页。 [↑](#footnote-ref-48)
49.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14页。 [↑](#footnote-ref-49)
50. 根据马克思与施蒂纳二人的出生以及生平表可知，在这里施蒂纳所针对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赫斯，因为

    施蒂纳在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时是1844年，彼时的马克思还处于《神圣家族》阶段。 [↑](#footnote-ref-50)
51. Saul Newman, *Max Stirner*(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23. [↑](#footnote-ref-51)
52. John Carroll, *The anarcho-psychological critique: Stirner, Nietzsche, Dostoevsky* (London: The Gresham Press, 1974), pp.39. [↑](#footnote-ref-52)
53. John Henry Mackay, *Max Stirner: His Life and His Work* (California: Peremptory Publications, 2005), pp.83. [↑](#footnote-ref-53)
54. 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68页。 [↑](#footnote-ref-54)
55. 参见[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131页。 [↑](#footnote-ref-55)
56. 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27页。 [↑](#footnote-ref-56)
57.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402页。 [↑](#footnote-ref-57)
58. 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footnote-ref-58)
59. 王时中：《实存与共在：萨特历史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footnote-ref-59)
60. 本雅明·图克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出版商，同时更是美国杰出的无政府运动倡导者，他

    预言这本著作一定会掀起巨大的浪潮。 [↑](#footnote-ref-60)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页。 [↑](#footnote-ref-61)
62. 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第153页。 [↑](#footnote-ref-62)
63. John Carroll, *The anarcho-psychological critique: Stirner, Nietzsche*, Dostoevsky, pp.60. [↑](#footnote-ref-63)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8页。 [↑](#footnote-ref-64)
65. “在施蒂纳主张个性、独自性后面，仍然隐藏着私有财产的支撑。”——引自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第164页。 [↑](#footnote-ref-65)
66. 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第165页。 [↑](#footnote-ref-66)
6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8页。 [↑](#footnote-ref-67)
68. John Carroll, *The anarcho-psychological critique: Stirner, Nietzsche, Dostoevsky*, pp.39. [↑](#footnote-ref-68)
69. Saul Newman, *Max Stirner*, pp.124. [↑](#footnote-ref-69)
70. 参见[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第336页。 [↑](#footnote-ref-70)
71. [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footnote-ref-71)
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0页。 [↑](#footnote-ref-72)
7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footnote-ref-73)
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9页。 [↑](#footnote-ref-74)
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footnote-ref-75)
76.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第136页。 [↑](#footnote-ref-76)
77. John F. Welsh, *Max Stirner’s Dialectical Egoism: a new interpretati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2010),p.3.书中说历史学家已经对于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阐释了很多，但是史蒂芬·马拉默、拉林客·斯扎布的诗歌显然可以看出也深受施蒂纳的影响，他甚至对易卜生的戏剧还有马歇尔·杜尚和马克思·恩斯特的艺术产生了影响，同时很有很多人也怀疑他还影响了瓦格纳和尼采。 [↑](#footnote-ref-77)